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化向度研究

石丹阳, 吴宁, 李幸霖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救国思潮一起被先进知识分子引进中国, 在经历一次次思想论战后, 最终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 是因为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诸多内在契合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论、大同社会思想、人本思想等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法、共产主义理想等具有丰富的共同因子。在这些共同因子影响下, 马克思主义自引入中国后就不断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 并且在融合过程中不断扩大在中国的影响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而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功的早期融合为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A 81; G 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2) 01-0001-09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对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具有深刻的影响。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缘及其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 在一次次思想论争中, 先后战胜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实验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各种主义, 最终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 成为中国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和旗帜。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助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 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厘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引进与传播过程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

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文化动因

马克思主义产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而中国传统文化来自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累积,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诞生之初便被中国人引进、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在这一时期, 中国刚刚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不久, 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觉醒, 试图寻找救亡图存之道, 西方思想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虽然马克思主义在那时由于工人运动的兴起已经在欧美得到广泛传播并显现出巨大的价值, 但中国封建社会在发展进程方面与西方社会整整相差一个时代, 对于引进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做好思想和理论的准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 中国的先进分子探寻出多种多样的救国方案, 其中重要的诸如源自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洋务运动、以宗教思想为武器的太平天国运动、试图通过变法实现君主立

[收稿日期] 2021-05-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7FZX030)

[作者简介] 石丹阳(1991—), 女, 山东蒙阴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宪的维新运动、推动农民阶层新觉醒和知识阶层认同现代文明价值的义和团运动、试图通过武装起义实现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试图重塑中国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但是,救国的理想总是无法实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深刻的思考得出要救中国就只有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发现马克思主义比其他任何主义更适合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由此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最终选择,并不负众望,引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复兴。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是20世纪初中国各阶层社会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社会力量大致分为三大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其中知识分子阶层通过报刊、译著、文章、演讲、工人夜校、农民讲习所等形式,系统引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工作;工人则通过夜校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积极运用到实践中,积极开展各类工人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逐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农民则在接受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教育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农民运动。

中国各阶层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并非偶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方法、观点和价值追求等方面有诸多内在契合之处,马克思主义蕴含诸多中国文化因子。这些共通之处和共同因子构筑了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引进、传播和接受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在一次次的关于思想和主义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最终选择。中国传统文化有“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朴素唯物论、有机主义世界观、大同社会理想和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本思想的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有天然的亲和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坚持唯物的观点与辩证的方法。古代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的老子、荀子、韩非子

以及宋代以后的张载、王安石等许多思想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及其统一都做出突出贡献。其中,老子在春秋末期提出“道本论”,创立道家学说,强调“道”是世界的本原及万事万物发展演化的规律,提出“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道产生于自然,不以人的意识而转移,是一种客观存在。道家思想的提出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否定了当时广泛传播的天命神学观念^[2]。同时道家也蕴含着丰富的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等辩证法思想,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3]5}、“千里之行,始于足下”^{[3]134}等。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不是偶然,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西方很多人对于现代中国人为何对辩证唯物主义如此热衷感到无法想象,在他们眼中,辩证唯物主义是欧洲的思想体系,古老的中华民族没有理由如此轻易地接受它。但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会说,太妙了,这好像是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结合的产物^{[4]63}。虽然学术界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源自中国这一命题有很大争议,但中国儒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具有的类同之处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哲学体系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5]。李约瑟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黑格尔与莱布尼茨,其中莱布尼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非常深的渊源。李约瑟认为,中国宋代新儒学的有机主义世界观为莱布尼茨的哲学体系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与佐证^{[4]67}。莱布尼茨确实对中国有着高度的关注,长期与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保持联系,还出版过一本介绍中国的专著——《中国近事》,这是德国历史上首部关于中国的著作^[6]。他比较中西方文化,指出中西方在手工业工艺与技能上不分上下,西方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西方与中国相比却要相形见绌^[7]。莱布尼茨相信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美国学者孟德卫(Mungello, D. E.)把他的这种中西方文化一致性假设归纳为12个方面,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易经》和他的二进制数学之间存在的一致^[8]。莱布尼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何如此容易被中国人接

受具有重要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重视工业、科技, 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强调人的思想精神等内在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最高发展形态是共产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大同社会是符合人们生存最佳状态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在本质上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未来社会构想, 但在理想目标、价值取向以及对人、社会与自然的态度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共通性和相融性。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未来社会有着丰富多彩的美好向往, 这些向往最终浓缩于大同社会理想。较为完整的大同社会理想形成于秦汉时代, 其思想基础有孔孟的“天下有道”“仁政”“井田”“王道”等, 又以“天下为公”为核心, 是2 00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大同社会理想千百年来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中, 体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 也成为中国百姓对现实社会的评判标准。大同社会理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思想牵引力,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都深受大同社会理想的影响。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构想的未来理想社会, 这个理想社会具有三个关键特征: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的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那里“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9]。到那时, 社会的强制分工将消失,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将消失, 劳动将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本身的需要, 社会将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 实现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10]。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构想。(1) 价值追求不同。大同社会理想反映的是农民平均主义的价值追求; 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于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 其形成基础为工业文明和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反映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2) 形成的理论基础具有本质差异。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基础上, 仅是一种知识分子或百姓主观愿望的体现; 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建立在马克思主

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上, 是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概括与总结。(3) 实现的路径具有根本差异。大同社会实现基础是社会的道德水平达到极高的高度, 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状态, 主要依靠“圣贤”与“君子”而非社会普通的“劳力者”;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达, 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又具有诸多共同之处。(1) 两者都基于现实并高于现实。大同社会理想针对的是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礼崩乐坏”、贫富悬殊、家国动荡的社会环境, 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针对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尖锐、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严重、社会发展的扭曲异化; 两种理想都直面人民的困苦, 旨在破除不合理的现实, 强调人民要在现实中而不是在虚无缥缈的天国中享受幸福。(2) 两者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及社会功能具有很强的相通性和相融性。大同社会理想和共产主义社会理想都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批判功能, 给迷茫和困顿中的人指明发展目标与方向, 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信仰力量, 具有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动员力。(3) 两者都体现了对人自身内在价值的终极追求, 都以人为本, 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 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大同社会理想的“天下为公”的价值诉求是个体与整体的内在统一、人际关系的和谐圆满。马克思主义要消灭阶级剥削、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社会化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共产主义是以人为本的崇高理想, 以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真正的共同体为目标。

近代以来, 中国社会逐步陷入被动, 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急剧发生的社会变革, 尝试把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与外来文化融合, 以建构与新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理想。如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把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和西方基督教的平等思想相结合; 康有为则把大同社会理想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结合, 提出了“太平世”的社会构想, 即世界没有国界、“人民皆为世界公民”等^[11]; 孙中山把大同社会理想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以

及社会主义思想融合。虽然这些融合与尝试在实践中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开启了中国人新理想社会的构建,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作了积极的准备与铺垫。

二、社会主义学说译著潮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广泛传播和接受的必要前提。毛泽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带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最初始于晚清时期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有机融合的。

中国人民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始于社会主义的引进与介绍。海外留学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主体。蔡元培概括性总结了20世纪早期中国引进社会主义的3个途径,即通过留日学生由日本间接输入、通过留法学生由法国直接输入以及学者在国内报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章。蔡元培指出,这3个渠道都以留学生为主体,其中以留日学生和流亡日本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最为积极。^[13]

自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的传教士就陆续在中国传播了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部分内容,但这些内容零散、不成体系,是无意识的,多以猎奇为视角,并未在中国引发过多关注和深层思考,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1)1871年法国爆发巴黎公社运动,当时旅法的中国人王韬、张宗良共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巴黎公社运动的报道,在香港《华字日报》等报刊发表,而后这些文章被王韬补充后,集结出版为《普法战纪》一书^[14]。该书仅限于西方重大社会事件的记载与描述,未引起对中国社会

的反思,于1873年8月出版并获得曾国藩等中国社会名人关注。(2)西方来华传教士金楷理(Carl T. Kreyer)和林乐知(Young J. Allen)等编译的《西国近世汇编》,介绍了19世纪晚期西方各国发生的大事件。该刊物是最早向中国人介绍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刊物之一。在该刊物中,前者被译为“康密尼党”或“康密尼人”,后者被译为“欧罗巴大同之义”“贫富均财之说”等。(3)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万国公报》在19世纪90年代曾先后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的译著《回头看纪略》和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述的《大同学》。前者为中国人描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后者向中国人最早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真正有意识地传播社会主义始于20世纪初。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中国民族危机凸显,国内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清王朝岌岌可危,曾经的“天朝上国”竟已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这对中国人的思想造成巨大的震动与冲击,中华民族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自身与世界,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变法维新的思潮及其运动蓬勃兴起,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自此从根本上改变。在这场救国图存的运动中,“以日为师”、赴日留学成为一股热潮。此时,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经全面开花,甲午战争的胜利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的兴起。甲午战争使日本军事工业成为引领日本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龙头,甲午战争后日本利用战争赔款、战争期间掠夺的不义之财等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浪潮,设立了数量众多的工厂、银行,修建了铁路等。快速工业化的后果之一是工人的数量迅速增加,生活费用上涨,导致劳资矛盾加剧,日本面临日益激烈的社会冲突和严重的劳资矛盾。日本的社会精英开始研究如何应对这些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思想由此在日本取得实质性的发展^[15]。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的社会团体,成为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渠道。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

开始通过自办刊物的形式翻译和传播社会主义,以留日学生为主力的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传播高潮在1902—1903年达到顶峰后一直持续到了1912年,但随后便陷入了低潮,减少了对社会主义的关注,主要原因除了当时知识分子本身的局限性而不能真正系统把握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外,还有就是:(1)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并没有成功实践的例子;(2)没有形成社会主义的政党。1900年,中国留日学生成立了第一个翻译团体即译书汇编社,编辑出版了一本以刊登政治译文为主的杂志——《译书汇编》。《译书汇编》发表了一系列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译文,其中许多著作论及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也涉及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中国人早期接触和了解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是1901年1月发表的杨荫杭翻译的《近世政治史》部分章节,介绍了19世纪后期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以“均富说”来阐述“麦克司”(即马克思)的学说。另一本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为由浙江省留日学生同乡会于1903年在东京创办的《浙江潮》。《浙江潮》以宣传民族革命思想为办刊宗旨,尤其重视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1903年10月,该刊物刊载了一篇根据日文资料编译、名为《新社会之理论》的文章,对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该文把社会主义比作增进人类社会福祉、消除社会苦难的社会治疗之术,还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共产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两种流派,而后者即为无政府主义。该文介绍了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但认为社会的主要危害来自于政府官员,主张国民应该有自治的权利,表现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支持倾向。

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除了自办刊物还翻译出版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日语著作。如1902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罗大维翻译的《社会主义》一书,其原作者为日本学者村井知至,这是首部在国内出版的日文社会主义著作的译著。该书系统阐述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背景及其原因、社会主义的定义以及社会主义与道德、教育、美术、妇人、劳动团体和基督教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并在最后构想了理想社会的社会形态。在该书中,马克思为1864年成立的国际

工人协会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段落被多次摘译,尽管其译文准确性有所欠缺,却成为最早在中文社会主义译著中被摘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又出版了日文版社会主义著作《近世社会主义》的译著,由赵必振翻译。该书在系统介绍了社会主义的产生根源、各种社会主义政党派别的政治主张、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定义、各个社会主义学说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并且罗列推荐了一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近世社会主义》还特别设立一章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在书中对支持与反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观点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是中国第一部设立专章对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进行介绍的译著。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还出版了由周子高翻译的译著《社会党》,其原著也为日文。该书系统介绍了欧美14个国家的社会党及其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政治主张,并着重介绍了瑞士的各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社会党》把欧洲的社会主义归为虚无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3个类别。

这些社会主义译著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特别是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间播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种子,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中国历史运动的轨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源自日本,郭沫若在20世纪80年代访问日本时曾指出:“我开始学习社会主义,是读了贵国福井准造先生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本著作。”^[16]这股翻译和传播的热潮一直持续到1912年,经过这波热潮,社会主义学说的脉络已基本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为“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早期社会主义译著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据美国学者马丁·伯纳尔(Martin Bernal)考证,《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社会党》三本著作的主要思想并非源自西方经典社会主义原著,而是源自美国关于社会主义的科普性书刊,它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并不系统而显零散,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而忽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并把“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暴力形式

只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17]。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共产党宣言》的译介。1903年,赵必振在其翻译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中介绍和评价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意译的手法翻译为“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其中“成一新社会”是赵必振添加的。同一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杂志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一文。该文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的介绍具有深远的影响,使马君武成为中国最早的以论文形式阐述、传播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学者。马君武在文中深刻分析了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历史分析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社会主义大加赞赏,暗指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同时兼顾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1905年11月26日,朱执信在《民报》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第一次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主要思想及其历史意义,并依据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和解读了部分段落内容以及第二章之十大纲领的全文。此外,宋教仁、叶夏声、廖仲恺、刘师培等也分别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摘译与评价,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却直到1920年才首次出版。陈望道早年留日期间就研读了众多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归国后便积极传播革命思想,1920年开始秘密躲在一间破旧草棚内参照戴季陶赠送的日译本和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的英译本翻译《共产党宣言》,历时3个多月而完成。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1920年8月22日终于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陈望道的这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对于在苦难中彷徨的中国人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给予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革命群众以不可估量的力量。

三、新文化运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必然伴随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冲突与融合。辛亥革命以后,袁世

凯窃取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伊始便阴谋复辟,在思想领域大力推行尊孔复古,试图利用传统儒家封建思想实现复辟称帝的目标。袁世凯的复辟行径得到了康有为等曾经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支持。杨度、美国人古德诺(Goodnow, Frank Johnson)等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陈独秀、李大钊等猛烈批判袁世凯的尊孔复古思想,强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国封建落后的根源,发起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是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的出版发行,后改名《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刊物。

新文化运动得到许多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仁人志士的支持,他们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为更好地宣扬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需要一种新的语言文字的表达形式,于是他们又发起了文学革命。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从1918年1月起,新出版的《新青年》正式使用白话文并将标点符号也改为新式符号。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的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这篇小说彻底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属性,在中国社会引发巨大的反思。在《新青年》的旗帜下,白话文被越来越多的人和刊物接受,各种报刊或改为白话文或出版了白话文副刊,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新闻时评都开始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一场文学革命使中国报刊业的面貌焕然一新。

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众多爱国知识分子的努力下,以《新青年》为主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禁锢中国人千年的封建思想枷锁,在阴郁、落后、愚昧、封闭的思想氛围下如春雷般惊醒了中国民众尤其是千万青年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

四、“五四”运动助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晚期被介绍到中国,

并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的特别关注, 仅是当时引进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股涓涓细流^[18]。“五四”运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化, 促使新文化运动迎来一个全新的高潮, 成为中国文化史的分水岭。毛泽东指出, “五四”运动前后构成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的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化战线的斗争在“五四”运动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19]696}, “五四”运动所引发的文化革命是对中国封建文化的彻底斗争, “五四”运动后“中国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 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9]696-697}。

“五四”运动前, 清末民初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零星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前后,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孙中山曾于1905年初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访问位于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 并与当时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和书记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 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主张, 指出民生主义的目的就是平均社会财富, 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孙中山的带领下, 马君武、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革命派知识分子发表了大量著述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国民党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达到高潮。在孙中山的指示下, 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人纷纷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代表性刊物有《星期评论》《建设》《觉悟》等。这些国民党人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 在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瞿秋白曾指出: “戴季陶、胡汉民、朱执信先生, 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20]无论是维新派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革命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还是处于片面的或零散的状态,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多有曲解并持批判立场, 其对社会的影响非常有限, “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行系统传播和广泛传播的起点^{[18]4-14}。

1918年, 李大钊的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号发表, 宣传讴歌“十月”革命。在他的改造下, 《新青年》逐步转变为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众多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仁人志士最终发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不能改变中国命运, 试图选择新的救亡图存道路。李大钊通过《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力宣传, 引起了陈独秀的关注和支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新青年》逐步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宣传与推广, 成为知识分子们针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论战的主要阵地, 其中最为重要的论战有三次, 即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者和梁启超之间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战。这些论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被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所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得以不断扩大。

“五四”运动一个重要成就是促使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同时也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随着“五四”运动后的系统宣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断扩大, 到1920年开始具有真正的广泛影响力。“五四”运动使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 陈独秀认识到,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民族解放这一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21]。在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以后, 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周作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决裂。在此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者也认识到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20年8月至1921年初间, 在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毛泽东、王尽美等人的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成立, 中国基本完成了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所需的思想准备、政治准备和阶级准备。

五、文化向度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就突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具体实际结合的必要性。在与胡适进行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过程中,李大钊就特别指出,社会主义者若试图让社会主义在现实世界中产生影响,就必须研究如何把社会主义理想应用于周围的实际环境^[22]。陈独秀则强调青年要以马克思研究实际的精神研究社会的各种现象,指出最重要的是研究现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不能仅仅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要将学说运用到实际行动中,对社会进行革命^[23]。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把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用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以及推动欧洲文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中国老百姓乐于接受、易于接受的中国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等3点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涵与要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4]。

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被重新激活,而后者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丰富的养分和深厚的动力^[25]。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是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100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致贺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6]。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来赢取决定性胜利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互动,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坚定自觉、一以贯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2).
- [2] 朱晓鹏. 老子哲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99.
- [3] 老子. 道德经[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 [4] 李约瑟. 四海之内[M]. 劳陇,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 [5] 窦宗仪. 儒-道的阴-阳辩证一元观新探[J]. 胡为雄, 译. 哲学译丛, 1991(1): 60-65.
- [6] 张西平. 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52.
- [7] 夏瑞春, 编. 德国思想家论中国[M]. 陈爱政, 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7: 3.
- [8] 孟德卫. 莱布尼兹和儒学[M]. 张学智,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104.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71.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05-306.
- [11] 康有为. 大同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7.
- [12] 陈晋. 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J]. 中共党史研究, 1990(6): 42-47.
- [13] 耿春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研究述论[J]. 中共党史研究, 2016(2): 101-114.
- [14] 胡为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百年历史: 上册[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 116-117.
- [15] 谈敏. 回溯历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367.
- [16] 向坂逸郎, 田家农. 郭沫若与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M] //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郭沫若研究》编辑部. 郭沫若研究: 第七辑. 北京: 文化

- 艺术出版社, 1989: 282.
- [17] 李博. 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83.
- [18] 石仲泉, 鞠俊俊. 热话题与冷思考: 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 (2): 4-14.
- [19]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 [20] 瞿秋白. 瞿秋白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310.
- [21] 陈独秀.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3卷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406.
- [22]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
- [23] 陈独秀. 陈独秀文章选编: 中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177-178.
- [24]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11册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658-659.
- [25] 宣言. 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 [N]. 人民日报, 2021-06-08 (1).
- [26] 习近平向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N]. 人民日报, 2021-05-28 (1).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Marxism in the Early Stage of Its Dissemination in China

SHI Dan-yang, WU Ning, LI Xing-li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Marxism,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y-saving thoughts,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by advanced intellectuals. After going through repeated ideological debates, it was finally accepted by China's advanced intellectuals and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because it has internal consistency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imple materialism, Datong social thought and humanistic thought i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ve rich common factors with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alectics and communist ideal. Under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these factors with China, Marxism was continuously expande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lso transcended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anks to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The early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vides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rxis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inicization

(责任编辑 冯庆福)